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委員春秋



委員春秋

周文華題

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周文华

主 编:张 静

副 主 编:杨南欧

责任编辑:张 兰

封面设计:陈 锺

内 部 发 行

书 名:委员春秋

出版单位: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

承 印 厂:哈尔滨市龙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8 年 10 月 印数 2200 册

开本 大 32 字数 16 万 印张 6.75

黑新出图(1998) 165 号 工本费:12 元

目 录

医海无涯

..... 傅世英 (1)

我的历程

..... 郭守昌 (47)

拳拳之心报祖国

..... 赵士杰 (62)

我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 王金陵 (95)

拳拳爱国心 切切报国行

..... 许振英 (113)

我任国民党兵工署长的一段经历及见闻

..... 黄德馨 (118)

张学良派我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 黄宇宙 (156)

我所经历的国民党六十军起义

..... 张第东 (171)

游寿先生传略

..... 栾继生 (203)

医海无涯

傅世英

“人之医，其业也深，其境也无垠”——题记

我于1919年11月10日(农历9月18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县(现为德惠县)的朱家城子镇。青少年时代求学于长春、沈阳。1937年春季考入沈阳盛京医科大学，1943年，结束了7年的大学生活，以优秀成绩毕业留校。从此，开始了一生的从医生涯。

1952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两年后，受当时哈医大领导的邀请和聘任，来到哈医大，被任命为副教授，兼临床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分管心血管系统工作。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为黑龙江的医学发展贡献出了我的青春年华，洒下了无数辛勤的汗水，与许多患者与各界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篇幅所限，兹就“文革”结束后，二十多年的经历作简要回忆。

一、执教从医五十年

1976年10月以后，十年动乱结束，科学的春天又重新到来。此后的形势和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和振奋。其时，我虽已白发满头，却青春焕发，老当益壮，有争分夺秒努力工作的紧迫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省全校我首批晋升为教授，当了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1979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同时担任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1985年，我取得了博士导师的资格，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年，经批准，在原来心血管病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包括流行病学研究室、电生理研究室、导管研究室、超声心电图研究室和冠心病监护室等5个研究室的哈医大心血管病研

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尽管集教学、科研、医疗工作于一身，我的感受是，工作越多越愉快，越忙越高兴，一心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几十年的岁月流逝了，理想却没有流逝，我仍然在执著地追求，一步一滴汗的往前赶……。

我自 1943 年盛京医大毕业后开始从医执教，一晃，到 1993 年已是整整半个世纪。这年的 10 月，我刚从西安全国第四次心血管学术会议上，捧回一份厚重的奖品和奖状，11 月 15 日，黑龙江省政协、省民盟、哈医大等单位和省城各界人士，为我执教从医 50 年暨获得全国心血管事业卓越荣誉奖，特别举行了一次庆祝座谈会。到会的有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教委、省卫生厅、省民盟和哈医大等单位的领导与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还有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座谈会上，省政协周文华主席、哈医大金铮校长、民盟省委副主委洪伯铿教授以及省卫生厅、省教委的负责同志等，他们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了许多对我来说其实是名实难副的溢美之辞。不少单位和好友还分别向我赠送了表示美好祝愿的纪念品。省委单荣范副书记送来写着“医风高尚”、“教泽深长”的两幅条幅，表达了中共省委对我的评价与关怀。民盟中央和民盟中央组织部张继域部长也从北京给我发来了贺电。我的优秀学生、青年心血管病专家、当时的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现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刘晓程的那份“谢师”贺电，使我欣慰、激动。这些，都是对我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文华同志还赠我这样两句古诗：“天地无情头尽白，江山有幸眼终青”。“头尽白”，是岁月的馈赠，是自然的规律，何怪天地无情？“眼终青”，倒是真的，只因江山有幸我有幸，所以才得到祖国、人民的如此厚爱与垂青！

这次座谈会，在我生命史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我认真回顾了半个世纪来，自己在医学领

域中辛勤耕耘的足迹。

1、普通园丁 盈庭桃李

解放初期，我在哈尔滨医师协会讲习所担任过教务主任，在医师讲习班主讲过内科学。那时虽不算正式杏林园丁，但已接触过教学工作。

到哈医大工作后，我一直把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当成自己最崇高的两大天职。几十年来，年年都有临床课，教学任务一直很繁重。从本科一期到现在的1.7万多名毕业生中，多数都听过我的内科临床课。每学期要为几百人上大课，还要领学生查房，进行诊断示范。为了讲好每堂课，提高教学质量，除了精心备课外，还要不断充实教材，不断更新知识。做到每堂课有讲稿、有图表。在教学中，我十分重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教育学生，比如，我在讲授每节课程内容或具体疾病时，都要通过疾病的发生和机理，引导学生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教导学生只有从整体联系的观点来考虑局部病变与相互作用，才能正确的认识疾病、诊断疾病，也才能正确的治疗疾病和预防疾病。进入临床阶段学习的学生，很快就要走出校门为病人看病，对他们就要严格要求。我领实习学生查房，一边查，一边就考问实习学生。实习学生向我报告病历时，我边听边自己动手检查。你说病人脾不大，我一摸，不对，马上就说，脾大了多少，让实习学生再摸；你说肺部没罗音，我一听，有罗音，再让实习学生听，把着手教。如果不这样，医疗质量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也不能保证。靠哄学生，什么事都马马虎虎，不严格要求，人才是出不来的。同时，结合临床教学，对他们进行医德医风教育，也十分重要。因此，我常结合实例，课前课后给学生讲：“医生的职责就是奉献，奉献是不能讲条件、讲代价的”；“一个医生，并不是罩上白大褂，悠悠哉哉的穿房而过，就能治好病，而要与病人朋友般相处，把病人当亲人。”二十年、三十年后，当有的当了院长、教授的学生，突

然来看望我，并毕恭毕敬地站在我的面前，认真地复述我过去曾问他们讲过的这些话时，一种幸福感顿时流遍自己的全身。春风吻桃李，桃李舞春风，这对每位当教师的人来说，大概就是最大的满足吧！

“学贵自成一家”，也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我经过长期在教学第一线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叫做风格吧。编教材，讲究体例的科学性，注重章节编排的灵活性。课堂上，讲究授课中思想脉络的清晰，注重逻辑层次的严密，尽量使每个教学环节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学生反映，听我的课，内容新、有条理、易懂好记。

1979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接受了培养首批研究生任务，招收了李玉光和张玺玉两名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李玉光进行电生理方面有关窦房结电图的研究；张玺玉则进行心肌形成机理方面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两人分别在各自的课题研究上，取得了满意的成绩。1981年，他们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由于这是哈医大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十分重视，特请北京医大林传骧教授来校主持毕业论文答辩，校长和全校教授也都参加了这次论文答辩会，规模盛大。我作为导师，颇感欣慰。

为了深入开展心血管病的治疗工作，八十年代初，我在黑龙江省各地，还多次主办了心血管病进展学习班，为全省培养了1000多名心血管内科专业人才。

1985年，我被批准为内科博士生导师。当年，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就是1979年我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张玺玉。他在我的指导下，先后读完了硕士、博士两个学位，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从1985年起，每年我既招博士生，也招硕士生，教学工作，也

主要放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博士研究生，是进入高层次学习的高级医学人才，对他们的要求自应更高。我常引用古人说的“人之医，其业也深，其境也无垠”这句话来勉励他们。因为医生是个很严格的职业，作为医生，面对的是病人的生命，容不得你半点马虎，要求你尽心竭虑，毕生为之献身。我还告诉研究生们，从医，要在“悟”字上下功夫，随时随地要做有心人，要善于观察，善于联想，善于决策。现在，医疗设施完备，各种检查、诊断仪器现代化，这固然是很好的条件，但我们决不能光依靠仪器设备去看病。一个医生的真正水平，主要体现在他诊断治疗疾病的基本功底，取决于他能否正确地根据临床观察、分析思考、正确地判明病情；取决于他用手、用眼、用脑子的能力。现代化设备不过是病史和体验的补充而已。我想，这些个人经验和体会，书本上是有的，但却是很珍贵的。作为教师，不仅要传医术，还要传医德和治学之道，只有这样，才算尽到了自己的天职。

1979年我60岁，但我没有一点老的感觉，依然精力充沛。那年，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力安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我说，希望我在离岗前，能为黑龙江省培养20名医学研究生。李书记的话，代表了中共省委的委托，变成了我工作中的动力。在我的指导下，到1993年，已先后有10名硕士生毕业、10名博士生毕业、整整20名。看来，当年李力安书记面交的任务，我是已经提前完成了。在我的研究生中，出了人才，出了成果。有的很有成就，写出了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荣获了不同的各级奖励。他们，无论在校内、校外，还是在国内、国外，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工作出色，崭露头角，是一批大有希望的跨世纪的医学人才。到1995年，他们当中，已有8人晋升为教授，另有5人评上副教授，还有2人已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研究工作。

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是最值得庆幸的。以哈医大一院心血

管内科和心血管学研究所为中心,几十年来,在我的扶植下,成长起了一批实力很强、技术过硬的医学队伍。我年事已高,重担已落在他们的肩上。现在,他们都是一批学有所成、知名度很高的专家教授。如黄永麟、赵宏安、王茹贞、刘凤岐、何厚琦、孟繁超、李为民……等。我和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但是,我从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他们对问题完全可以独立思考,不同见解,尽可保留。评定成绩,也不要非得符合我的意见。在同事之间,出现学术之争或工作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我都以诚相待,持之以公。我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应该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如果学生只停留在老师的水平上,科学就不能前进。韩愈早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郑板桥在他的诗中也说“新竹高于旧竹枝”。培养扶植了学生,学生超过了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就很满足,深感不虚此生。

在我执教从医 50 年之后,又有一次零的突破。1994 年,我终于赢得机会,首次成为博士后导师,正式接受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王乐民博士进入我们哈医大心内科博士流动站做博士后工作。王乐民是 1991 年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从事心血管临床和研究工作的。1994 年 6 月 3 日,省人事厅、省卫生厅、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等单位,还为此举行了隆重仪式。在我教学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1995 年,我已七十有六,为了给国家多培养人才,再次招收了三名博士研究生,继续辛勤耕耘。作为一名杏林园丁,眼看盈庭桃李,其乐无穷,壮心不已。

2、医疗、科研、力求创新

医学是和死亡作斗争的科学,在医疗技术及其科学研究上,要求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所以当医生的,即使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也永无止境。

我栖身杏林 50 多年,虽说没有“操千曲”、“观千剑”的功底,也算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距离“妙手回春”那样的高境界,依然很远,至今还只能说是个追求中的理想。

但我没有虚度时光,从 24 岁正式穿上白大褂的那天起,就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在从医道路上,第一重视总结经验,第二力求开拓创新。1944 年在沈阳盛京施医院,及时总结了彻底洗胃治愈鸦片中毒患者的经验,1945 年到 1946 年又在哈尔滨役人医院,及时总结了应用“914”砷制剂治愈大量回归热病人的经验等。这些点滴经验,后来都成了铺垫在我前进路上的一砖一石。

五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两年进修,获益匪浅。既得到当时张孝骞教授等名家的精心指导,又受到当年协和医院传统制度的严格训练。协和医院具有一整套科学而严格的管理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病案室,病人只要在这个医院住过一次院,病案则终生保管,如果有住院病历号或提出病人姓名,即使是在几十年前住过院,病案也会很快查到。病案的质量很高,当时全用英文撰写,字迹非常清楚,资料保管又非常完整,对各级医生查房均有详尽记录,对会诊、病案讨论或病人死后经病理解剖并进行临床病理讨论的病案,对每位医生的讨论意见等均能完整无误的记录在病案之中。对这些讨论意见,大都经负责医生整理好,然后经发言医生审阅后,才记录在案。这些病案不但可供医生或学生查找分析,书写论文、进行临床科研而用,而且也是很珍贵的学习资料。协和医院的图书馆(现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的医学科学书籍藏书量大而全,对很多学科的期刊均能查到原始文献,管理得井井有序。同时实行开架管理,对近年出版的期刊或新书,均可由读者自己查找。阅览室的环境肃静而整洁,无论是医大的医生、进修人员、全体医生或持有阅读证的其他医务人员,都养成一个良好的读者习惯,往

往在晚间或晚饭后开始读书直到深夜。有时为了科研或写论文需要查找很多杂志文献时,只要提出期刊卷号,交给管理人员,绝大部分均可马上查到,如果已被他人借出也可尽快为你找回。这套科学而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病案室和图书馆,当时被誉为协和的“三大法宝”。北京协和,是一块成长医学人才的肥沃土壤。我在协和进修的两年,是开拓医学视野的两年,是收获提高的两年,也是增强工作后劲的两年。同时也结识了当代医学界名流邓家栋、朱贵卿、钟惠澜、刘壕、谢少文、胡正祥等人。

五十年代初,哈医大还处于创建阶段,仪器设备不足,远远适应不了医、教、研工作的需要。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学校和省领导的支持下,通过各种渠道,竭尽全力地为我院心内科引进了一批又一批先进技术设备,如心电图、英国制 NEP 生理记录仪等。在当时,我是为哈医大、为黑龙江省引进心电图学的第一人。不久,我又日夜兼程的为学校编写出第一本心电图学讲义。我在给学校毕业班学生讲授这门心电图学的同时,又面向全省开办心电图学习班,向省、市各大医院推广心电图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向黑龙江省介绍、推广心电图学的第一人。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以心电图学为中心的各项科研工作。第一项科研工作是与刘贞铮教授一起完成的《200 例正常国人心电图的统计分析》,接着又和徐静肃教授一起完成了《对肾血流量和肾小球滤过率的研究》。这两篇论文在《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发表后引起了医学界、特别是国内心血管病学同道和东欧一些国家专家的重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此后不久,我又先后与一院儿科宋铭教授一起完成《中国小儿正常心电图学分析》,和一院内科王茹贞教授一起完成了《中国正常人的食管导联心电图分析》。这些工作,都为我以后开展心血管工作准备了条件,使我能朝着攻克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科学峰峦一步步

攀登。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当务之急,是努力降低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我认定了这个目标,几十年来,上下求索,左右奔驰,为之奋斗。我虽是临床工作者,却十分重视心血管流行病学和各种实验性研究。如把肺心病的研究、风湿性心脏病和冠心病的研究等等,我都纳入自己的科研工作之中,力求在医疗技术上不断创新,不断开拓新领域。

1957年,我参加了协和医院黄宛教授举办的全国首次右心导管学习班。参加这次学习的大多是当时国内各地优秀心血管病学骨干,我记得有陈灏珠、翁心植、邵耕、富璞云、陈思聪及我等10多位。这次学习班,主要是讲授如何应用心导管诊断先天性心脏病的最新技术。据黄宛教授介绍,应用心导管诊断先天性心脏病,最早是由美国一位医生于1936年在他自己身上试验成功的。以前内科医生主要靠听诊器来诊断先心病,如今应用心导管新技术,只须用一根特制的管子从手臂静脉血管插进去直通到心脏,根据心房、心室各部位压力变化及血氧分析情况,即可确诊病变部位及性质,这就叫心导管术。当年黄宛教授曾赠送我两条德国制的心导管。我就用这两条珍贵的心导管,在省内推广心导管学和心导管术,使先天性心脏病得到明确的诊断。同时,我还学习推广了心血管造影术,为心血管病手术治疗创造了条件。

1957年,跟我一起在黑龙江省首次开展右心导管检查术及选择性心血管造影术的主要参加者有赵宏安、王茹贞、曲淑芹等人。经过大家的努力,使心导管术迅速在边远的哈尔滨、黑龙江开花结果,为救治先天性心脏病病人增大了安全系数,并对开展心脏外科的治疗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提到当年开展心导管术和救治先天性心脏病病人时,我不能不以沉痛的心情,衷心怀念因患胃癌已于1995年春不幸逝世的徐敬

业教授，在此插一段，多说几句。1957年，我从北京黄宛教授学习班归来。立即开展心导管工作。徐敬业教授成了我开展这一新技术的密切配合者。每当治疗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病人时，术前，由我进行心导管诊断，确定出病变位置，随之由他有目标的开刀手术。术中，由我参加监测，术后，共同参加监护。我们两人联手，配合默契，不知救治了多少先天性心脏病病人！我们在一起，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就这样，我们在共同救治病人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爱好多种体育活动，特别善于游泳。他游泳时不但速度快，而且姿态标准、优美。我到年近40岁时才开始学游泳，就是受他影响并由他一手教会的。我们俩人是哈市游泳馆的常客，同时被该馆聘为急救医生。也曾多次在游泳馆一起抢救猝死的病人，两人口对口地为猝死者做人工呼吸，结合由体外进行心脏按压，终于使病人起死回生。这些情景，至今想起犹历历在目，怎么也忘不了。徐敬业教授是我们医院胸外科主任，外科功底厚实，学风纯朴严谨，医风医德高尚，是黑龙江省心胸外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熟练掌握心包和二尖瓣手术的基础上，开展过各式各样的先天性心脏手术，在外科领域，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徐教授多才多艺，不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诗词家。科学家的才气和诗人的才气，在他身上兼而有之。每有新作，常在民盟、政协会议上朗诵，让大家分享。碰到高兴时，他也单独为我吟哦高歌一番，使我也陶醉于他的诗情之中。他的诗作，不仅发表于省内外，也发表于海内外，日本《一衣带水》诗刊上，就经常有他的格律诗词发表。他一生写诗几百首，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生前未能结集出版。我作为他的挚友和他的亲属一起，已将他的遗著《江流采》结集出版。如今面对徐教授的诗集，见手泽犹存，痛斯人已去，不禁凄然于心。特在这里补记几行文字，以寄托我对徐公的哀思。

大跃进开始的 1958 年,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基层厂矿卫生所和农村县级医院实习。我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发动广大师生,栉风沐雨地奔走在龙江大地,搞了一次大规模(36,652 人)的高血压病普查工作。历时年余,终于统计分析出了我国北方有关血压的正常值、高血压的患病率和高血压的患病因素等等级有价值的科学数据,摸清了高血压在东北地区的发病规律,为高血压病的防治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组织大家写出了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在 1959 西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心血管学术会议上发表后,引起了同行们的兴趣,也从此填补了黑龙江省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的空白。其后于 1979 年和 1993 年哈医大心研所流研室的同志们又先后两次组成黑龙江省协作组参加了全国性大普查,并把先后三次七普查资料组合分析撰写进《黑龙江省 32 年来高血压病的消长和发病因素分析》论文,发表于黑龙江省的医学杂志。

在开展以上各项研究工作中,一直得到协和医院张孝骞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医学,是一门干到老、学到老的科学。我每次去北京,总要随同张孝骞教授查几次病房,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他也不断给我出题目,提建议。如在肺心病人风湿性心脏病的研究上,张教授就给了我不少支持。1960 年,我在参加人群普查的巡回医疗中发现,肺心病人和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很多。其后,张孝骞教授建议说,东北地区寒冷,肺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发病率高,至今还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来进行研究,你应当去开拓。

在张孝骞教授的鼓励下,从 60 年代初起,我开始主攻这两种病。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在临床上投入运用外,还以哈尔滨市医学会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宣传倡导对这两种多发病、常见病开展防治工作,多次组织学习会和报告会。同时,为了引进一批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设备,以便进行高难度的尖端医学的研究。我除了争取医院、学校的支持外,还到处游说,筹措资金,甚至一直找到当

时的黑龙江省委主管财经的领导杨易辰副书记。经费批下后，我高兴的在 1965 年购置了心电图量仪、多导心电图仪、染料稀释曲线测定仪等一批仪器。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完成了一批由临床到治疗和发病机制的论文。在肺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1964 年，在全国心血管内科兰州会议上，我所作的关于肺心病的学术报告，又一次引起全国同行们的重视。当时，大会主席陶寿教授拉着我的手说：“快把你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吧”。可惜后来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写这本书的愿望没有实现。好在当时中华医学会十分重视，特为此在《中华内科医学杂志》上，出了一期肺心病专号，还约我为这期专号写了一篇专题讲座稿和一篇发在刊首的“编者的话”的文章，从而在全国心内科同行中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算是弥补了一下未能出书的不足。那次会后回哈途经北京时，又受北京同道盛情邀请，在北京阜外医院就肺心病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此后不久，我还在《中华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肺心病功能性肾功衰竭方面的论文和一批有关论述风心病方面的文章。

60 年代，我又先后发表了我国的第一例血小板无力症的病例报告和世界第一例寄生于蜘蛛膜下腔的病例报告，以及凝血酶原消耗试验的临床应用等文章。

1966 年夏，当我接到全国第二次心血管学术会议通知，正着手准备参加会议的论文材料时，因“文革”已经开始而中断。

1970 年，尽管我当时处境困难，基本是半工作、半被审查状态。但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我顾不了许多，仍坚持和北京协和医院吴英凯教授一起，在哈尔滨共同主办了全国第一期心血管进展学习班，并与吴英凯教授共同编著了《心血管进展》一书。

1972 年，我从“牛棚”里出来不久，就请示领导支持，搞起了心

律复转器和体外心脏起搏器的试制。以及相应的动物实验，终于为抢救急性心肌梗塞病人闯开了一条新路。

1973年，在刘广仁教授的配合下，我在国内较早地开始了对于急性心肌梗塞的监护治疗，在黑龙江省最先启用冠心病监护室（CCM），并把心脏起搏除颤器和心电示波监护仪开始应用于临床。最初，我们只开辟了一个仅有三张床位的急性心肌梗塞监护病房，我和几位青年住院医生、护士一起，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称之为简易监护工作。对来住院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采用人工直接监护的手段，对病人的心电图、血压和呼吸实行24小时的细心监护，医护人员分分秒秒不眨眼，轮流注视着莹光屏上病人心脏的每一次搏动。如果莹光屏上出现了早搏或快速性心率失常，我们用利多卡因来控制，如果出现了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纤颤，我们就用同步除颤的方法来救治病人。血压低了则用加压药。一旦病人呼吸心脏停止，就首先进行口对口的或气管插管进行人工呼吸，同时争取时间采取插管呼吸法及心脏按压法来急救。关于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现在有的青年医生把它说成是50年代的急救法。意思是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我认为，这种急救法永远需要，也永远不会落后，不管医疗技术如何先进，不管仪器设备如何完备，也不能代替它。因为为了争分夺秒，这是在任何场合最快、最有效的抢救法，它不仅是医术问题，更主要的是医德问题。面对垂危的病人，一个真正能把病人当成亲人的医生，一个真正对挽救病人生命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医生，一个真正医风医德高尚的医生，在紧急关头，决不会考虑到脏不脏、累不累或男女有别等问题的。医生的心灵美不美，我可以由此得到最好的检验。

记得在我们简易监护病房成立不久，就成功地抢救了我们一院党总支书记金洪久同志的生命。金洪久同志平时身体不错，是打乒乓球的爱好者，一天下午，他打了一阵乒乓球后，自感心前区痛